專題**對話**

命運共同體與新海洋文明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 鄭海麟
香港亞太研究中心

摘　要：在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中，以往的看法是，西方文明源自海洋，其基源問題在於理解和克服大自然；中國文化源自平原，其基源問題在於使平原上不同的部族和諧相處。事實上，中國歷經幾千年發展，已不再是平原文化那麼簡單。明代鄭和下西洋，開創了中國跟其他海洋國家的文化交流，逐漸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起一個以中華文明為紐帶的朝貢體系，這是中華文明通過開拓海洋建立起來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一個文明體系。現代美國建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系非常相似，以文化和價值認同為核心，然後與結盟國家建立起安保關係。今天，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戰略中，提出了建立海洋的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中國文化傳統的整體思維，以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仁愛文化，能夠吸收融合西方的普世價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成果，最終得以構建人類共同的價值觀。

關鍵詞：海洋文化；平原文化；宗藩體系；人類共同價值；命運共同體

海洋文化的探討

■：鄭教授，你最近研究的是海洋的問題，這就讓我想起，早期中國的文化是大河流域的平原文化，沿著黃河及長江的平原開創農耕文明。明朝也曾以鄭和開拓過海洋，但整個中國文化未發展成為海洋文化的性格。改革開放的時候有走向海洋的想法，至今中國海洋大輪已航向全球了，當今中國的海洋文化已展開。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開始時，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化起源的關係，其中提到海洋文化實際上從地中海開始，西方文化是海洋為主的，希臘、羅馬是通過航海去做貿易，做生意，而且建立強大的軍隊和艦隊，攻佔其他地方成為殖民地，有了基本的發展以後他們才產生偉大的哲學思想、文化藝術等等，然後慢慢成為西方文化的根源。我記得我最早看到這個說法，主要是高中一時讀到朱謙之(中山大學的教授，我母親的老師)的一本書《文化哲學》，裏面提到這個說法，就是海洋的文化跟平原的文化的區分。之後讀梁漱溟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較早寫過東西文化地理環境的根源，那個年代他們作出這樣的比較。

希臘文化的基源問題源自海洋

海洋文化是面對著大海的無定和變幻，希臘用大船航海，面對大海忽然產生兇險巨浪，有敬畏也有好奇，形成希臘文化的「基源問題」(借用勞思光教授的名詞)，是要理解和克服大自然，並產生對宇宙的驚歎感(sense of wondering)，要求理解經驗宇宙種種變化的規則，盼能掌握不變的道理，人即能夠控制得住變幻。希臘哲學家通過歐幾里德幾何學(Euclid of Alexandria)，來找到數學上不變的公理系統，作為宇宙後面的理性真理，這個也成為他們的科學思想的根源，以理性真理架構，去瞭

解經驗界的秩序。西方發展科學，是要理解和征服大自然。希臘文化是以理性組織物質世界，希臘人則重個性自由及個人身體的健美。西方的基源問題是理解和克服大自然，西方漸產生一種征服的精神，而且因對宇宙的驚歎感，要理解宇宙後面的奧秘，這成為他們文明不斷求真的基本動力。

中國文化的基源問題源自平原

相對來說，中國文化開始的時候，不是以海洋為中心，中國文化開始在中原，以黃河流域為主。先由黃河開始，後來南移到長江，再南移到珠江。中國的發展以大河文明為本，在大河兩邊的平原開展文化。遠古時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氏族，這些部族共同居住在平原裏面，沒有大山把他們隔開，所以平原比較容易把他們融合，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它是最基本的問題，即基源問題，如何可以把這個大平原上不同的部族讓他們和諧和平相處，從而產生早期的中國文化。中國的理想是通過聖王的統治，禮樂的教化等，帶來各種和諧。中國的基源問題是人與人、人與宇宙的和諧，故中國重包融多於征服，重人與宇宙調和，參與萬物創新，且堅忍剛毅地克服困難，不斷求美善和改進共處關係。

中國由明代到當代海洋發展的歷史

中國歷經幾千年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平原文化了。中國的大海也有一個很長的海岸，由這個大海出去我們沒有地中海，卻是太平洋，我們只遇到日本、台灣，都是一些島，再過去很遠很遠才到美洲，所以中國發展海洋，在古代來說不是最重要的，要到明朝時候才有海洋的發展。在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中國以他的國力可以造很大的船，通過鄭和下西洋，雖然明成祖的原意本是為了查探惠帝的下落，但結果完成一個很特別的使命，即中國跟其他海洋國家的文化交流。當時中國的艦隊已經開到非洲的東岸及印度，航行到很遠的地方，有人還說鄭和的船隊到過美洲，不過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個說法。可惜由於中國從前不注重海洋文化，鄭和以後知識分子還是把他的材料燒掉了，因為怕宦官利用這些材料來再花費大錢去航海，而且之後因倭寇之海上干擾，開始鎖國，大方向不重視海洋的發展。很可惜，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就沒有再發展海洋文明。在明以後，清朝以後，西方勢力侵略東亞，敵人坐鐵甲輪船和軍艦，從海洋打來。中國的海洋發展一直都是很有限的，停留在沿岸的近海，重在保衛中國邊界。到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突破從前內陸形態的經濟，而且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的船隊已經全世界都去了，新的類似鄭和這樣的船隊已經有很多了，中國的遠洋航運發展在科技上已經完全可以做得到了，中國的艦隊在亞洲也算是非常龐大的艦隊。

但是總有國家在南海一帶跟中國爭土地，歷史上南海島已屬中國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竽平定南越。次年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珠崖、儋耳兩郡在海南島，管轄南海諸島，並派水師巡視西沙。唐、宋時期歷史地理著作將西沙和南沙群島相繼命名為「九乳螺洲」、「石塘」、「長沙」、「千里石塘」、「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萬里長沙」等。清朝在1841年編纂的《瓊州府志》，均把「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列入廣東省瓊州府萬州轄治範圍內。在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南海諸島都屬廣東省。1939年佔領諸島，到二戰結束後，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派艦重行接收南海諸島，且在南海很多島上都有立碑，但是後來越南也搶佔了一些，菲律賓也說一些是他的，馬來西亞也說有些島嶼是他的，這就引起周邊國家對於南中國海上的島礁有了爭議。而戰後美國的勢力已伸展到西大平洋邊界，使太平洋成為內海，見中國在太平洋邊控制一大片的海洋，對美國的霸權則相對削弱了。中國人開拓海洋的時候面對很多政治和外交上的問題，如何才能打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海上絲綢之路，怎樣以和平方式能夠達致未來的戰略目的？這方面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海洋的命運共同體

□：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建軍70周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青島閱兵，後來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演講，他裏面提出一個概念叫：「建立海洋的命運共同體」。以前講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特別突出「海洋」的概念，現在就是把「海洋」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新概念提

出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中國對海洋方面看起來越來越重視了。前幾年還是建立海洋強國，現在進一步提出海洋的命運共同體，意思說全球化了，應該和平相處，相互之間應該友好睦鄰。

中國發展海洋文明有過輝煌的歷史

其實這個概念我認為我國從明代就已經有了稚型。根據我自己的研究，幾十年前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我們是黃土的文明、黃色的文明、黃土高原、黃河流域；不是藍色的海洋文明。實際上中國曾經在發展海洋文明方面也有過輝煌的歷史，海洋的文明在中國實際上也曾經充分獲得過發展，或者說曾經有一個發展的時期。最起碼從明代的鄭和下西洋開始算起，甚至再早以前，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已經對日本、琉球進行了一些外交活動。而鄭和艦隊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大規模遠程航海活動，最遠航行到了東非索馬里那些地方，實際上那時已經開拓了一個海洋的文明。為什麼當時能夠做到，因為當時明代的綜合國力在世界上應該是很厲害的，因為那時候歐洲還處於黑暗時代，哥倫布也還沒有發現新大陸。在這之前幾十年，甚至差不多一百年。那個時候西方沒有充分發展也沒有經過工業革命，那個時候中國本身的自給自足經濟已經發展得很充分。而且他的造船技術、科學技術特別是在手工業方面、造船是很厲害的，可以造到運載上千人的帆船。像現在的幾千噸級的那種輪船或戰艦。這在當時來說國力還是蠻不錯的，在當時來說處於世界先進水平。據比較確切的數字統計，在乾隆時代中國的經濟能力佔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那個時候西方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後，所以鄭和他們那個船隊在當時來說是一支超強的船隊。

明代建立第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體系

明成祖朱棣也有這樣的雄才大略，希望不只是局限於黃土文明，還應有海洋文明。而且通過實施以王道而不是霸道的外交政策，把周邊的三十幾個國家，特別是東南亞還有東亞、琉球、朝鮮等都納入到中華朝貢體系裏面。據此我就認為，實際上明代建立的中華文明體系是第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體系。實際上也是通過發展海洋文明，依靠海軍的實力，通過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來實現的。我認為很多歷史學家實際上有一點誤解，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找惠帝，實際上沒有那麼簡單。我仔細研究過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資料，比如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等等。瞭解到鄭和下西洋的整個布局走向，很有戰略規劃。而且正是鄭和及其艦隊，第一個把馬六甲作為戰略要地。也正是鄭和艦隊，在馬六甲建立起第一個軍事基地。因為他要繼續前行，就需要提供龐大的艦隊補給，所以就必須要有一個基地。現在美國在那裏搞軍事基地，實際上是步鄭和的後塵。原因是馬六甲的地理位置很重要，進可以進到印度洋、東非，退可以震懾整個東南亞海域。當時東南亞海盜很猖獗，所以他必須在那裏建立一個軍事基地，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周邊國家，即明朝認可冊封的朝貢國家。這與現在索馬里海盜猖獗、中國也經常派艦隊去保護商船、去維和的情況很相似。這些情況在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裏面有很清楚的記載。鄭和艦隊前後抓了兩次海盜首目，把他們抓到北京去砍頭，後來震懾住那些經常騷擾周邊國家的海盜。

美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系非常相似

當時東南亞海域共有三十幾個國家，包括現在的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汶萊、印尼及周邊那些地方。震懾住了海盜以後，這些國家皆紛紛表示願意內附明朝，嚮往中華文明。於是，明朝通過鄭和七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逐漸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起一個以中華文明為紐帶的朝貢體系。實際上我認為就是傳統的那種宗藩關係。我認為這個就是中華文明通過開拓海洋建立起來的並且具有世界意義上的一個文明體系。過了幾個世紀之後才有英國的英聯邦體系。繼英聯邦體系之後，直至二戰以後美國才建立起以美元為本位的新文明體系。實際上美國建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系非常相似，以文化和價值認同為核心，然後與結盟國家建立起安保關係。所以我首次提出美國以安保條約建立起來的新文明體系實際上是明朝對外關係的翻版，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新宗藩體系。從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實際上中國是最早開拓海洋文明的，而且建立起一個世界意義上的文明體系。這是開文明發展史先河的，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我七、八年前就開始探討，寫過一篇《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對外關係再認識》的文章，發表在《太平洋學報》。這篇文章提出鄭和第

一次建立起具世界意義的中華文明體系，美國在二戰以後也翻版了鄭和建立文明體系的經驗，建立起美元為本位的新宗藩體系，並且以他自己的一套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系統即所謂「普世價值」要求結盟國家必須認同。

明代的「理」與「禮」文明

通過對鄭和下西洋的重新探討，我覺得明代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除國力強盛以外，實際上中華文明在當時是很成熟了很高級的一種文明。傳統儒家經過宋明理學的整理加工改造，建立起新的一套價值系統即「理」，然後將它內化為一種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即「禮」，這個行為規則(禮)經約定俗成之後就變成一種制度文明。這種制度文明到明朝鄭和那個年代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雖然是封建時代的制度文明，但在六百年前當時的世界應該是非常成熟和高等的文明。它在整個亞洲，甚至非洲，沒有一個國家能達到這樣高的文明程度。所以鄭和船隊去到哪裏都很受歡迎，主要是他的文明很高，他的價值系統普遍給周邊國家接受，東南亞那些國家的制度文明還處於未成熟的半開化狀態，而中華文明已經很成熟了，所以他能夠為周邊國家普遍接受。

下西洋維持了150年的和平

但是為什麼鄭和經過33年七下西洋，後來慢慢就不能繼續下去了呢？因為消耗的國力太大，他花費的銀兩之多，我按現在的比值估算，鄭和船隊每一次遠航折合人民幣計算起碼要幾百億，七下西洋沒有兩千億是拿不下來的，那個時候還是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時代，生產力遠沒有達到今天的水平。就算你的綜合國力佔世界三分之一，那你花了幾千個億，也是一個巨額的開支，所以七下西洋之後搞得國庫空虛了，所以給朝廷經濟帶來沉重的負擔。又由於這個航行活動不是以經濟活動即賺錢為目的，不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以盈利為目的，他是非盈利的，純粹是維和，布施王道，送東西等。所以實際上他是一種以王道開路傳播中華文明的活動，目的在於文化交流和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睦鄰關係。這樣的一種傳播文明的活動，最後因沒有經濟效益，所以慢慢就把國家經濟拖垮了。明代朱棣的繼承者覺得以後再也不能這樣做了，所以就把相關資料燒毀了。但是有一點很多人不注意，實際上鄭和七下西洋，雖然花了33年，但是他維持了150年的和平跟穩定，整個明代到中後期對外關係方面基本上都是和平穩定的。倭寇進來以後慢慢才在東南沿海一帶出現騷擾，中國那時候才開始走下坡。所以整個明朝與東南亞那些朝貢國家的關係，可以說保持了150年的和平友好睦鄰關係。這個是有史料記載的。

明代文化的平民性與自由性

■：你這看法很有見地，明朝的文化價值，建立了長期的海洋和平，是從東亞、東南亞到印度洋的命運共同體，這是明朝文明建立的典範。明朝的文化是很有特色，明成祖的天下觀有全球視野，這是與宋代有所不同。日本學者岡田武彥曾指出，宋朝理學的文化重點，是適應官僚知識階級的，明代則是適應平民的，明朝思想家具有某種自由性。如竟陵派詩人鍾伯敬說：「不泥古學，不踏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鍾惺：《鍾伯敬小品·先師雷何思習序》)說明他的作品超越古學的規則，按自然之性，自由創作，這充份顯示明代思想的自由精神。又文學評論家袁宏道在論其弟袁中道作詩時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注·敘小修書》)他提出了「性靈」一理念，即思想創作，出諸人內在的靈魂心性。

王陽明到劉蕺山發展「行」的實踐哲學

我慢慢掌握明朝的思想，明朝的理學，從王陽明開始一種自由落實的性格，他講知行合一，「行」成為他一個重點。「知」，也即是格物致知，宋朝已經講了。宋朝的理學還是帶官方文化形態，代表一種很高層次的，追求止於至善的大思維。相對王陽明顯得很民間，他的問題是如何「行」？即如何實踐，知跟行合一，你的良知跟你的動念是合一的，行導入你的意念動念的時候，如果你維持高層次的道德在你動念的時候，你就可以成為聖人，關鍵在這裏。

明朝的文化實際上也是中華文化發展到一個新時代，進到一種最深度內在的反省，以及追求現實上如何修養自己達到聖人的境界。這種實踐的思想，就一直發展下去，故在陽明之後的學者大部

分都很重視修養功夫，其中到最後是劉宗周。劉蕺山(劉宗周)很重視「慎獨」那種修養功夫，這種慎獨就是完全實踐性的，所以明朝的理學發展到最高峰，到最後就是實踐的把中國人希望的善能夠真正從你動念上行出來。然後劉宗周也在清兵入關以後絕食犧牲了，他也完成宋明以來很高的道德要求。

從王船山到當代中國的實踐哲學

明朝的思想下去就影響到清朝開始的王船山(王夫之)，王夫之很重視「行」，不只是道德修養上，而且是歷史大勢上的「行」，就是對歷史事件中的「理」跟「勢」分析，不是先有了天理，然後歷史跟著天理發展，而是從這個「勢」的發展，而產生「理」。「勢」是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從現實發現道理，從實踐發現道理，這是「行先於知」的思想，而這思想影響到毛澤東。毛澤東年青時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跟從恩師楊昌濟，楊的學問愛好及追隨王船山的思想，他特別強調「力行尤要」，「學者尤不可不置重於實行也」(楊昌濟：《告學生》，《楊昌濟集》)。青年毛澤東對楊先生最為佩服。當時湖南長沙有一船山學社，是譚嗣同老師劉人熙在1914年創辦，他很愛讀王船山之書，特別建學社以研究和發揚王船山的思想。青年毛澤東，受其師楊昌濟先生的影響，多次去船山學社聽講，並抄錄王船山許多語錄。毛澤東對王船山非常喜歡，他寫《實踐論》就具有這種實踐思想。由此可見明朝的文化跟思想一直下來到現在的中國，也有繼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的。到鄧小平，因為文革就離開了實踐。鄧小平時代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馬上又回到實踐上。所以我理解中國共產黨背後的思想，就是一種完全從實踐上來看現實，來不斷回應現實的一種哲學思維，然後到習近平，習近平重視全面性來審視現實。他的全面性就是通過一個整體思維，我認為整體思維是來自中國傳統哲學。中國自古《易經》的思想，是先看整體，然後整體裏面實際上現在怎麼平衡各方面的情況。當代中國基本上是有其中國文化的傳承。中國發展到現在，中國的海洋政策重新出來，是從明朝的實踐性思維下來的繼承。關鍵就是一帶一路的提出。

海上圍堵反而打開一帶一路的「命運共同體」

當中國興起的時候，美國開始緊張中國的成功，要用圍堵政策封住了中國海上的路，所以在南海，美國就跟日本連盟，日本也利用與中國敵對，讓他可以建軍，美日再連結台灣、菲律賓、越南等等，建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第三島鏈等等，希望把中國海路包圍。所以中國出海是被島鏈或者其他國家封住了。所以中國才提出一帶一路。所謂一帶一路，陸上就走絲綢之路，可以通過歐亞大陸的腹地往西邊去，這個實在很重要。英國過去曾經有個說法，千萬不要讓中國跟俄羅斯連在一起，兩個那麼大的國家如果連在一起之後，歐亞的腹地都給他佔據了。美國最笨的就是奧巴馬從海上封中國，又在烏克蘭那邊搞俄羅斯，這樣俄羅斯跟中國合起來，中間很多國家馬上都可以通了，所以新的絲綢之路從這邊就過去了。還有海上的一帶一路，這些東南亞國家跟中國關係還是好的，雖然海洋上有些少的爭端，中國也不以這個作為一個敵對的形態。然後慢慢就提出命運共同體，就變成一個中國的普世價值。從王陽明下來，在這個基礎上，最好的實踐就是保合太和，也就是和平與和諧，命運共同體就是這樣一個最後可以實踐的理念。

我講個笑話，王陽明在理學特別重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王陽明在陽明山，劉宗周是劉蕺山，還王船山，都是山。之後有孫中山革命，講知難行易，到毛澤東在井岡山，毛澤東在延安寫《實踐論》，實際上是通過井岡山的實踐中來理解怎麼很靈活的回應那麼龐大的軍隊圍攻，還可以打得贏或者逃得掉，都是實踐的。所以《實踐論》綜合井岡山下來，在延安寫成。之後到改革。鄧小平、習近平再加王岐山搞定了中國的改革與腐敗問題，兩平一山，總共六個山，這樣把中國這幾百年的近代史、文化史連成一線，這條線再連著海洋發展，就到絲路和海洋上的一帶一路，這樣就產生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

現在習近平的全球性的理念，主要就是命運共同體，也是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文明思路。在國內是重整體的，對外是共同體，來完成中國文化從

明朝到近代發展的一條文化線索，貫穿到現在，國力強了以後就可以重新在文化上有個新的概念提出。我不知道中國人有沒有自覺，如果他明白的話，實際上會提出文化的新理想。美國不太高興這樣的，但是我們實際上應該有些好的東西提供給全世界。

知行合一與改造世界

□：我認為，我是從總結明代中華文明來觀照今天的世界。一個是你講的王陽明那些，因為中國人王陽明也好，王船山也好，他們都是重視知行關係，行就是實踐，知就是內省，反省自己達到很高的境界，然後去實踐，把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踐。知行關係，孫中山強調知行合一，實際上毛澤東《實踐論》也是講知行關係，他是通過你講的總結井岡山的鬥爭經驗，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學，鄧小平是通過反省文革的失敗教訓，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不是他提出，但是這個理念是獲得他的支持才產生的。

■：是胡耀邦班子的人在《光明日報》首先提出。

□：是胡福明，胡耀邦時代南京大學哲學家。實際上他也是反映一種知行合一的知行觀，是中國人的知行觀。通過實踐檢驗你的「知」是不是正確，必須通過檢驗，「行」，也就是通過實踐去檢驗。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思維邏輯跟行為邏輯。中國人的邏輯吧，就是這樣的，他對世界的認識，但是他是比較實用性的，這倒是真的。跟西方哲學家有所不同。西方哲學家主張哲學就是談知的，是一種認識論，不討論這些實際的東西，實際的東西他們認為是工程師或者專家們去做的，革命家講這些，哲學家就是探討世界，瞭解宇宙奧秘的，是分工的。他們與中國的哲學家不同。馬克思也許是在西方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學家。他說：「哲學家不但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還在於改造世界」。這個是跟中國的知行觀合拍的，所以中國的革命家為什麼與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就是因為馬克思提出了這一點。但是現在很多人也是認為，他這種觀點跟西方傳統哲學是不合流的，不是西方主流的哲學，但是跟中國的倒是合拍。所以中國現在鄧小平也好，習近平也好，都是要改造世界，還不單只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還在於改造世界。都是馬克思或者王陽明、孫中山這種知行合一的實踐者、執行者，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國人的特有思維。

明代高層次的價值系統穩定東亞秩序

剛才梁博士提到一點，就是中國人怎麼樣才能建立起一種價值系統？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為什麼明朝的外交能成功，因為他有一個很高層次的價值系統。這個價值系統支撐著整個中華文明，並且影響及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所以西方認為它是一個中華帝國。實際上帝國是侵略人、霸佔人家的領土才叫帝國。但是我不認同中華帝國這個概念，因為鄭和七下西洋並沒有佔領人家領土。他不像英聯邦到處佔領領土，建立日不落帝國。鄭和沒有，所以他那套價值系統我認為是一種王道，不是霸道。而西方英聯邦是有王道也有霸道，他通過他的一套價值觀，包括建教堂、建學校、醫院等等，布施仁義。但是背後還是以佔領領土，掠奪資源為目的，但鄭和不是。那個時候明代有傳統的一套價值系統，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發展很成熟了，還有一個關於禮治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等級觀念，對維持社會穩定很重要。當時傳到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家都很接受，包括日本、琉球、朝鮮，以及東南亞國家都很接受這一套禮治即等級制度，甚至包括朱熹提出三綱五常這一套倫理秩序，對建立當時傳統的社會，或者說穩定傳統的社會是很重要的，我認為它就是一套價值系統。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國主義摧毀了中華文明秩序

但是這套價值系統後來因為近代以後西方的思想傳進來，他們比較先進，所以後來就把這套價值系統摧毀了，特別是英國，堅船利炮打進來以後，在整個西方思潮衝擊下，這套傳統的價值系統就崩潰了。實際上傳統中國的這套中華文明體系，起到過維繫整個東亞社會穩定的那套秩序，其實是給明治維新後崛起的日本軍國主義打敗的。中日甲午戰爭是對傳統中國的致命一擊。五四運動又對傳統的價值系統徹底的衝擊。而衝擊過後又沒有重建新的價值系統，因為中國當時找不到什麼合適的一種新的價值體系。所以若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我認為它唯一的成功就是語言系統的更新，古文轉化為白話文是成功的。但整個價值系統被打碎了卻沒有重建。

命運共同體尋索新的全球價值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但也沒有設想出怎麼樣建立一個價值系統。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在近代以來傳入中國後也不能生根。因為剛才梁博士你講到一個價值系統，要在一個社會上生根，要經過反復的實踐。由宋代發展到明朝才逐漸成熟，及至清朝乾嘉年間進入鼎盛期，前後也是經過幾百年的實踐，才能夠把這套價值系統穩固，然後慢慢擴散到整個東亞或者東南亞。由一種價值系統的形成到整個中華文明體系的建立，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而且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現在我覺得習近平是有雄才大略的領導人，他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是很好的。其實我也曾認真探討過，他這個命運共同體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個是統一，第二個是穩定，第三個是共享。統一、穩定、共享三個方面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這完全是我個人琢磨出來的。因為他也是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在傳統的文明跟西方的文明裏面，去尋找適合中國自己走的路子。他講過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鞋子合不合腳，要自己穿了走路才知道。所以他也是吸收了西方的那些好的東西，然後結合中國的傳統的優秀成果，嘗試著去建立一種新的價值系統。當然這不是他一個人或者一代人能夠完成的，這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我認為，這個事情我們下來還可以深入探討，五四以後，舊的傳統的價值系統摧毀了，應該如何建立起新的價值系統？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探討努力的一個方向。

西方勢力使和平的東亞秩序崩潰

■：在傳統的中華文明發展到最高峰，就是宗藩系統下的一個外交關係，或者說是一種和平的東亞秩序。當然中國本身也保持一種武力上相當強大才可以維持這個朝貢系統，否則也很容易分散跟崩潰，而這個朝貢系統就給英國所打破了。西方攻過來，清政府根本擋不住西方的勢力，整個東亞國家沒有一個能擋得住西方，所以全都崩潰。崩潰以後西方文化進來多年，中國吸收西方文化一個世紀，也產生了五四運動，中國吸收了馬克思主義、人民的民主、科學科技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西方理性文化未能進到亞洲人的內心骨髓

但是西方文化沒有能夠進到亞洲人的內心骨髓，因為他們的核心精神理性，對亞洲人是理性及侵略的結合，西方理性不只是哲學上和科學上的思維，也是一種做事方式，西方人做事都用理性計算清楚，用一套理性程序來達至的，對亞洲侵略都有一整套策略。當研究西方理性思想及做事方式時，就漸瞭解他們如何用這種思維，來策劃侵略世界。我們在學習理性時，須反省如何不用之以欺凌他國呢？西方的精神，比如說他要做一個事件，他要把工具及程序先做好，他先要有一套客觀的系統，重程序公義及工具系統，為了達目的而用盡一切手段，這在韋伯(Max Weber)稱之為「工具理性」，其特色是一種不與他人和諧雙贏的思維形態。我們東方傳統辦事，重點不在客觀程序的公義性，如法律精神之類，卻重整體關係的和諧。工具理性要在亞洲生根其實不容易，因為我們亞洲的思維基本上還是以關係為本，重人和人的感通融和。中國人和東亞洲人重人性和人情，辦事要搞好關係，使大家團結合作，不想把人當成工具來利用。若一開始先弄一個客觀的工具理性，通過行政系統作為工具，來達到什麼目的等等的思維，亞洲人還是要先搞好關係，才講工具理性。

中國人已吸收科學科技

西方文化最成功是科學和技術，亞洲人吸收這方面，卻可以慢慢學到，能夠把他的一整套吸收，中國在這四十年最成功的是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技術。國家曾帶我們海外華人去參觀過一些科學園，我非常驚訝，中國已經發展到很先進。幾年前提過意見給政府有關環保各方面，但是後來中國政府帶我們看昌平的未來科技城，是北京市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三大科學城」之一，完全依環保原則來建造，搞的比我們建議的還好，中國就是早已把整套科技設計吸收進來，到需要用的時候，通過國家機器一運作就可以運作出來。

中國的整體多邊思維

中國在文化上不適應工具理性形西方文化，

因那是直線單向思考，不同中國的多事件整體思考。中國卻對馬克思主義吸收，特別是辯證的動態思維，因與中國的陰陽哲學思想可對應。此外，馬克思也有改造世界的主張，跟中國明末清初的實踐傳統可結合，這成為共產主義跟中國文化的關鍵結合點。當前中國已在改革後吸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且發展成功，下一步可慢慢把儒家文化中的良知、仁愛的善價值吸收，又從道家吸收大宇宙之道的觀念，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人性和本體基礎。建立新時代的中國文化價值高度，才可吸引全球各國各族各文化團結。

我自己在中國已經二十六年了，我進一步理解，中國是怎麼樣運作的呢？從過馬路方式可明白中國是怎麼運作的。西方人過馬路是跟著直線規矩的，在西方過馬路，行人紅燈就停綠燈就走，中國紅燈綠燈好像只是參考用的，主要是看處境，從整體看四方八面的汽車、貨車、公車、摩托車、自行車、其他人，各有其不同移動方向和速度，掌握全面互動中的空間，就可過路，過的期間也要和各車各自調整速度。中國人在過馬路是在回應一個龐大的互動網絡。車子大概什麼時候到我這裏，中間什麼空位我可以穿過去，而不是看燈為主，而是看車子的情況，然後再考慮如果有燈的話，哪些車會停下來，哪些車會不停下來，你要不斷的考慮，還有自行車、電動車和其他人要處理，很複雜的各方面關係。但是我們中國人就在掌握處境各互動情況下就輕鬆過了大馬路。不懂的話，跟西方那種直線理性系統，在中國過馬路也非常不容易的。

《易經》在關係網絡中求平衡的思想

由於我博士論文是研究《易經》的，《易經》是在一個龐大的關係網絡中互動的不同事件，彼此相關，在龐大的事件當中如何找到一個在這個事件裏面最好的和諧點及平衡點，找到那一點就「吉」，不掌握和諧及平衡就「凶」。所以中國人到一個地方一定看整體的處境和大局，而不是很細的每一小點來看。西方是分工很細的，一點一點，你做你的部分，我做我的部分。中國領導是看整體的，所以他一定對全面有個觀察，而定大方針，所以為什麼習近平有五個全面，實際上是全面來看，然後不斷在不同的形態裏面找平衡點，這個是《易經》形態的實踐，就是永遠看全部的情況，所以中國可以提出一國兩制這種思維。西方很少會闡述這樣，先有個大的理念再講下面怎麼做，西方一定下面怎麼做才講到大的，中國先定了大的，先立其大者，小者就可以處理了。所以中國處理問題方法跟西方非常不一樣。

西方以為自身體制是唯一普世價值

近二百年西方文化主導了世界，而自以為西方建立的體制是唯一普世價值，要求全球跟從。當西方見中國改革開放，以為慢慢影響，中國會跟西方一樣，只要產生了自由市場和選舉制度，西方即可用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同時支持一些傳媒影響民意，控制選舉結果。就可在政經上操控這大市場和大批廉價勞工，然而中國在制度上設限，攔阻了他們控制的機會。中國深思熟慮按自己國際改革，用自己文化和體制特色去調整，作出整套發展的道路安排，跟西方制度是不一樣的，某些西方學者以為西方的規則是真理，推斷中國遲早崩潰，結果吸收西方優點之後，仍是走自己的路，達至空前成功。所以西方對中國開始不滿，越來越要打壓。

中國成功的特色

中國成功的特色，是用中國傳統的整體思維，這是中國一個很特別的思維方法，裏面的價值觀就是通過和諧，命運共同體等，在整體的利益共享，互相分享，互相感通來作為一個根本點。在中國文化，「通」這個理念很重要。在研究身體觀上看，中醫看病，從血氣通不通來指出人的病源。在人處事上，必須要懂變通，在政治和人的關係上，重視瞭解民意，政通人和。如今對外打開一帶一路，跟其他國家關係就須要通，如何能夠通，思想文化上通，道路上通，高鐵通，公路通，海路通，做生意要通，外交關係要通。其實國哲學中，牟宗三就定義「仁以感通為性」，感通理念就來自《易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就是宇宙本體，原是安寂無動，但又可感應溝通天下一切根源。從人修養講，人以一個虛靜的心來看宇宙萬物，就能夠感應溝通任何的處境。「感」的意思就是進入他人的生命體驗中，就能夠通其內心

所想所求，而找到大家共同的好處。從這樣一種思維，在本質上就可建立命運共同體。

基本上「仁」就是一種感通，仁心看到他人的苦難我們就會覺得不忍，這是仁愛之心。然後感通變成一個價值觀的時候，對每個事件你都尋求有一個內在通透的瞭解。對不同國家文化能夠內在通透瞭解嗎？感應在哪裏？溝通點在哪裏？

在中國如果要建立一個新文明，應是一個仁愛感通的文明。五四之後，傳統文明價值全都倒下去了，五四以後我們沒有建立一個新的文明，我們只建立了一種政治體制而已，政治體制實現的過程也要遭遇很多曲折、困難，但是慢慢從實踐裏面慢慢調好，中國到現在才慢慢調到比較平衡，比較和暢，但是也會有時候做得不足或過分，總會有一些不好的東西給人看到的。他如何調到完全順遂，十分重要。

中文「順」跟「遂」這個字很重要，即如何「調和」，整理到一切順利，而達到目的。其思路是吸收西方工具理性的行政系統，但又在變化中靈活面對處境，在繼續發展中回應現實，有時候太緊不好，太鬆也不好，須鬆緊得宜。又民族主義須重視，特別在救亡圖存的時代，但是太強調民族主義，又變成激進民粹主義，破壞與他人的關係。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調順的可能性。中國最厲害的是懂得調和調順，我發現這是現在慢慢發展出來的一種中華文明新的模式，政治上的命運共同體，思想上是在感通和諧，保合太和，從《易經》這麼下來的。以這價值思路，慢慢繼續發展下去，完善命運共同體的方向。

通與調和

□：我覺得這個「通」很重要，梁博士講一個是「通」，一個是「調和」，其實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就是「通」嘛，從陸路上打通整個歐亞連在一塊，海路上打通整個東南亞，繼而通到北美洲，甚至通到全球，這個是「通」，只有通了才能建立命運共同體，通了以後地球就變小了，所以才有共同體這個概念，才變成現實，地球村了嘛。另外，「調和」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中國人一直在實踐之中去調和，調適自己，摸索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前早年提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就是在實踐中去調適。完全搬西方那一套，當然美國他們很喜歡，但是未必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你控制不了局面，到時候你用那一套，會產生一些混亂，完全用回到傳統那一套也不行，即使是回到毛澤東時代我認為也不可行，因為他沒有把中國八億人的吃飯問題解決好，所以回到那裏也不行。但是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認為它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最先是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後來經過調適後提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

吸收融和西方

實際上我發現，現在越調越完善一點。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好的那種，也就是逐漸的文明進化和講規範了。就學習到西方的科學技術，特別高科技方面，這是中國四十年最成功的，高科技這方面我覺得是後來居上，甚至很多方面連美國也自嘆不如。另一方面，他又有效的維持了他自己的那一套，所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那種西方人做不到的組織能力社會動員能力。所以他是在效率方面有優勢，也就是保持了傳統那種中央集權。以上強調的是效率。另一個是要強調公平。民主、自由、法治那些價值觀追求的是公平，也即是公平正義。這方面也必須逐漸去完善。比如說反腐敗，實際上就是追求一種公平跟正義，他在反腐敗方面力度很大。還有就是要發展高科技，如果不發展高科技，14億人的中國吃飯問題就難於解決，所以一定要發展高科技。一方面要使得國家整個建設和經濟繼續保持高速的發展，所以它一定要保持高效率，所以還是保持中國的傳統的中央集權那一套統治模式。毛澤東講：「百代猶行秦政治」。秦始皇建立起來的那套政治工程還是不能丟，因為有效率，能夠保持高效率。但是西方的民主、正義、法治那些東西也要吸收，我認為如果真的是命運共同體，按照我的設想，我認為他是一定要吸收西方的普世價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成果，最後建立起人類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我起了一個新名字，叫「人類共同價值」，就是大家都能夠認可的，一定要有讓大家都認可的價值。美國為什麼能夠在戰後維持霸權七十年，在世界各地橫行，就是因為它那套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法治為許多人所接受。它提倡的普世價值我認為是有他的合理性的，不可以完全否定普世價值，你應該去吸收它好的東西，不可以完全否定它，我認為否定普世價值非常愚蠢，應該吸收他，包容他。加上你傳統的文化，傳統的文明，共同構建新的價值系統。我們講的

仁義禮智信裏面，中華文明因素也很多，比如謙虛、包容、和諧，這些價值觀裏面也有很多是好的。最近不是強調二十四個核心價值觀嗎？雖然現在還停留在口號、標語的形式，但是如果能夠真的付諸實行，那當然你這個是作為一種共同價值，我想配合你的命運共同體可能很容易給人家接受，你真的做得到，二十四個價值，民主、富強、自由、平等、愛國、敬業等，那些東西也是西方那些好的東西，裏面也包含普世價值的東西，也有傳統文化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工程是一個很浩大的系統工程。提出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奮鬥的目標，一個理想，一個系統工程。但是裏面整個價值系統還有待完善，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提倡的二十四個價值觀是很重要的一個價值系統，但目前還是停留在概念上，要付諸實行還需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

中國的王道是以前定的國際法

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系統，也是經過幾百年，甚至從孔子算下來兩千多年的實踐才成形的。宋朝的理學家通過改造傳統儒家，發展出新的儒學，又通過禮治，內化到人們的行為模式，最後表現在對外關係上是以王道作為開路。其實王道裏面也具有很複雜的因素，我認為是當時傳統中華文明統治時期形成的一套規則，實際上就是當時國際間普遍都能接受的一種國際法。現在的國際法是西方人定的。而中國的王道，則是以前由中國人定的國際法。古代東亞的國際社會，特別是在儒家文化圈內，處理對外關係要按照中國的國際法，周邊的國家都要按照這一套禮治去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甚至整個東亞的秩序的穩定，都要按照中華文明系統即中國的王道去維持。直至近代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東亞的社會秩序開始發生變化。

日本東亞共榮是霸道

日本想當整個東亞的統治者，做霸主，原因是他打敗了中國，摧毀了中國的傳統的文明秩序。他想由日本主導重建東亞文明秩序，所以他也提出一個概念，即所謂「東亞共榮圈」。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命運共同體，近代日本則提出東亞共榮圈，他想用他那一套所謂的價值系統主宰東亞世界。但是日本推行他的價值系統是靠霸道，近代日本到處去打仗、去侵略人家，最後發展成為軍國主義。他那套的科學技術，特別是軍工科技很發達很厲害，到處去打仗。但是他就是沒有建立起為周邊國家所接受的價值系統，或者說他那套「大東亞共榮圈」的價值系統人家不接受，所以整個東亞社會都抵制它。抗日戰爭，不光是我們打了14年的抗日戰爭，東南亞也抗戰，表明他們也不接受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這套價值系統。日本的失敗在於他行霸道而不行王道，他沒有建立維持整個東亞社會穩定秩序的一套文明，或者說他的價值系統人家不接受。所以我們今天提命運共同體，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價值系統，而且同時也要讓周邊國家接受你，世界各國也要接受你，這樣才能達至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我提出一個人類共同價值，你要建立起一種人類共同價值，讓人家接受，你這個命運共同體才有實際的意義，而不能停留在口號上，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

中國曾建立第一個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體系

我覺得從人類發展進程來講，我這幾年思索的問題就是，實際上中國人也不光只是黃土文明，也曾經擁有海洋文明，後來因為沒有經濟效益，國庫空虛，結果被迫中斷了。中國人也曾建立起第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體系，即統治秩序，並且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過貢獻，特別對整個東南亞、東亞，甚至其影響到現在都還存在，特別在韓國、日本的很多傳統還保持著中國文化的那些優良的因素。後來因為西方的文明更強大，英國的英聯邦體制，他那個制度文明跟價值系統把中國傳統的文明摧垮了。我們經歷五四以後，一百年內到現在還沒有重建新的文明體系。後來二戰又因為日本的侵略，把中國搞得筋疲力盡。後來美國的整個價值系統在二戰之後取代英國，其實他所建立的是一種新宗藩關係，是翻版明朝鄭和時代的。比如美國也不喜歡佔領人家領土，它要人家認同他的價值系統，並且學習鄭和時代的明朝建立安保體系。而且還用發行美元控制人家經濟命脈。以價值系統的認同作為結盟的基礎，用安保條約建立起一種新宗藩關係，以美元本位維繫新宗藩關係的穩定，從而建立起戰後美式文明體系和世界霸權地位，這點很值得注意。

新帝國主義與新宗藩關係

■：美國如今是新帝國主義。哈維(David Harvey)提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指出在後殖民地的年代，西方不控制其他領土，用另

一套擴展的方式。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Capitalist Imperialism),以資本邏輯取代領土邏輯,如美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建立經濟支配力量,為了順利推動,美國把自己描繪成最高文明標準及人權堡壘,推動美國價值。但同時推動的是情慾放縱及自我中心的文化,成為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或可叫新的宗藩關係,實際上就是明代那種宗藩關係的現代版。他不像英國殖民主義到處佔領土地,美國也不佔有人家土地,鄭和也不佔有人家土地,他主要是通過輸出他的價值系統即文明,讓你認可,然後接受他,更主要的是他後面有一個美元系統,來印鈔票控制你的經濟,這個是最厲害的,說美國厲害就在這裏。當時鄭和還是處於白銀時代,雖然他也到處撒銀兩,但他沒有發明專利印鈔票,所以他的行為最後導致明代的經濟崩潰。我認為美國很可能從明朝的成敗中總結經驗,他們學習了明朝好的方面,避免了經濟崩潰這一壞的方面。同時他也不走英國的殖民主義道路,而是借鑒明朝的經驗建立新的宗藩關係。他不佔有人家領土,佔有人家領土很笨,你要派人去管理,最後又給人家趕跑了。所以我印鈔票多好,不用去佔有,不用派人去管理,你認可我,接受我輸出的文化跟價值系統,最後通過印鈔票把你的經濟控制住,所以他這是一個比較高明的辦法。美元本位體系,戰後也是經歷了七十年,到現在才開始出現衰退的跡象。到了後現代新自由主義泛濫,整個西方文明又開始衰落。美國現在是開始走下坡路了,整個西方也在衰退。中國崛起,中國崛起我覺得一個是依靠高科技,另一方面他在制度上,效率跟公平公正逐漸達到了平衡,這一點很重要,中國現在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你說完全的資本主義也不像。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優點是他能做到最有效和最大程度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去發展生產力,保持社會生產力的高速度發展,這是最關鍵的,不然他養不活那麼多人,所以最後提出一個命運共同體,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承擔想作為的責任大國的一種表現。中國想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所以他提出一套新的價值觀,而且也正在付諸實踐。當然這個過程中很多曲折,而且肯定會碰到很多阻力的,這個是肯定的,但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中國還是要重構一套新的價值系統,讓周邊國家認可的價值系統,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用你的人民幣取代美元本位體系。讓大家都認可你的價值系統,認可你的人民幣,而且中國的人民幣是有強大的生產力作為支撐,不是空頭支票,廢紙一張,他是真正有實力的。然後通過輸出高鐵及建築等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即能夠給人家帶來利好和福祉的那些power。又加上你有一套價值系統相輔相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大概是這樣吧,我的一點想法。

「命運共同體」應超出美國「新宗藩關係」

■:從新宗藩關係瞭解美國是很有見地的觀點。我想當前中國的「命運共同體」應超出美國那種新宗藩關係,而對其他民族文化有深度尊重,承認其不同而有價值,平等以互愛共享待之。中國如果真的發展出他的新的價值觀,中國的全球價值系統,以王道取代霸道,以立己立人之道取代新帝國主義,以仁愛感通和諧取代經濟政治操控,以命運共同體互愛共享取代霸氣欺壓掠奪,將會得到很多第三世界弱勢國的支持。新文明系統的日漸成功,與雄霸三世紀的西方文明並立,西方列強終歸還是會產生抗拒,形成文化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而產生文明衝突思維,要來遏制中國。亨廷頓在90年代認為冷戰以後,21世紀已經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文明的衝突,他預測西方和伊斯蘭文明衝突,911之後他講對了。他又說儒家文明跟西方會衝突,至今也算開始發生。

由於中國在四十年來國力已建立,全球看到中國華麗轉身,西方原是樂意見到中國提供廉價中低產品,西方仍操控著高科技研究。但沒料到,中國已能成功自己研發高科技,已經慢慢追上西方,西方就知道不能再獨霸高端知識,開始警覺,怕中國超過西方兩百多年的領先地位。原來中國對科技發展早有計劃,由於中國的科技人才很多,慢慢把這些人都召回國來發展,中國的科技就突飛猛進,當發展出5G系統,北斗衛星系統,及登月和火星火箭,差不多什麼技術都可以自己造出來了,就只差芯片,相信不久可突破。所以中國的國力、經濟、科技都已經達到一個很好的基礎,目前迫切的,只是文化還沒有建成一個新的、吸引世界的精神文明價值。

中國新的精神文化理念

建造中國新的精神文化理念，可以在道德人倫上重「仁愛感通」，社會處事上重「和諧共享」，自然保育上重「保合太和」，策略上重「實踐檢驗的知行哲學」，這些理念都可把過去文化跟現在通起來，從明朝到清朝到中國近代，到共產主義，是有一條發展理路，這些思路跟現在發展的成功也是相關，可成為一些元素去建構「命運共同體」。此外，文化上須創發新元素，如無條件的愛，為人犧牲的愛，能不能夠有人願犧牲自己，達到一種對人的愛，建立一個社會相親互愛的風氣，這就更站立於道德高地。此外，文化上也須多探索未來的盼望，我們目前的中國夢想是很當前的，未有很長遠的盼望，新精神文化須高瞻遠矚，思考未來人類怎麼走，中國如何帶動人類向前。在全球的合縱連橫，面對全球的大博弈，中國如何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慢慢發展出一個最好的未來，這是當前我們需要共同思考的。

古今中外共融與體制完善化

古代的中華文明經過「創造的轉化」，貫通現在的中國文化，如果還能夠吸收西方的優點，那就超越西方，更為壯大，這是古今中外共融的新時代。中國已吸收馬克思主義，發展出改造世界，以社會主義帶來公平公義。中國也以社會主義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全國富足的同時有公平調節。

下一步應深化改革，使社會制度更能完善，人民權利更得保障，特別是關愛弱勢的制度須完善化。中國的精準扶貧，已解決大部份貧困問題，但還有一些須努力加強的，如：

1. 醫保系統方面，須加強保障貧困人士做手術的權利，在醫院建立基金，資助醫保不夠錢做手術的窮人。
2. 社會富足後，家庭婚姻兒女常有困擾，須有更強社工和輔導系統。
3. 有些特殊弱勢者、如自閉兒童、腦癱兒童、精神病人重回社會、黑社會和吸毒者的更新等，都須發展社會支援系統，使社會更安寧。
4. 在法治上，須培訓執法官員，對基層群眾執法時，不要粗暴，能態度上尊重百姓。至於處理各種案件，法律程序都公平公正公開。如此可公正公義能夠建立，然後又能夠保障人權。

我相信通過五年，將慢慢把這些問題處理成功，中國就可以真正成為全球最成功的國家。

Destiny-sharing Community and the New Maritime Civilization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Zheng Hailin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of Hong Kong)

Abstract:Compar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has previously rendered the view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eing incepted through their seafaring prowess, by understanding and struggling against mother na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however, has her origin on the plains, whereon various tribes and people groups must learn to live with harmonious inter-relationships. But in actual fact, over the millennia,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not be simply confined as a development of the plains. Ocean voyages of Admiral Zheng H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ounde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versea nations;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did subscribe to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A truly significant world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maritime enterprises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building up her civilization. Currently the civilization system in America resembles the suzerainty system of Ming Dynasty. With culture and values identified at its core, security pacts are then enacted by America with her allies. Today, an objectiv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y seeks to generate a destiny-sharing maritime communit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based upo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holistic thinking, suffused by a moral culture of love that “seems motionless and still, yet penetrates into all affairs and events”, will easily allow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to be assimilated and amalgamated with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The end-product will be an edifying set of commonly shared human traits and aspirations.

Keywords:Maritime Culture; Culture of the Plains;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Shared Human Values; Destiny-sharing Community